

獨目文存

張厚余

張厚余 著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文学批评与研究

猷 自 文 存

张厚余



张厚余 著

書 名：《独自文存(文论集)》

作者：张厚余

出版者：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龍中央郵局 73369 信箱

規 格：175 × 240 印 張：27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78-962-8735-26-8

定價：港 幣 65 元

人民幣 50 元

作者简介

张厚余，山西寿阳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太原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典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傅山研究会副会长，太原市作协原副主席，太原市六、七、八届政协委员，山西省诗词学会、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太原市诗词学会顾问。主要著作有文艺评论集《寻芳履痕》，散文集《秋华集》，诗词集《凝春集》，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傅山诗文选注》、《太白诗传》、《杜牧集解评》、《元曲精品类编·关汉卿卷解评》、《明清小品文解评》、《祁隽藻诗注析》等。主编《全宋词鉴赏辞典》，参与编撰十余部国家级古典诗词曲鉴赏辞书。获省市诸多文学理论、创作奖项。荣膺“杰出贡献艺术家”、“太原市优秀作家”称号。

菊 玉
玲 石
兄

雅
正
存
念

厚
饒

2015.11

敬
贈

福自
上存

赵国柱
题签





2010年作者与恩友孙涛于太原



2007年11月毅飞于太原

总序

尺此文章耳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之以发扬。思想而不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摘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国维)先生纪念碑铭

总序

只此文章耳

孙 涛

厚余兄诚邀我为其即将付梓的《独自文存》写篇总序，我自知才学不够，笔力不逮，但多年朋友，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了。厚余兄长我八岁，从彼此相识，到一同共事于太原市作家协会，已经三十余年，可谓人熟、心通，文字交往，更是不可细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一张纸，不为厚余兄写点文字，我心里也过意不去。然而，用什么标题，才能概括厚余兄七十多年的人生和他即将付梓的《独自文存》呢？我想，简略地说用五个字即可总结，那就是太原明末清初一代文宗傅山先生所言：“只此文章耳。”

最初与厚余兄相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其时，我刚刚拿着一纸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山西大学毕业证，被分配到太原市北郊区委通讯组“帮忙”。政工组领导对我说的明确：你出身不是“红五类”，先去“帮忙”，依表现再决定去留。“文革”前，极左思潮已越刮越盛，考大学政审第一，成绩第二，已是公开的秘密。我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虽对北大心向往之，却在报考志愿时被器重我的知心班主任偷偷告知：报考北大是绝无一点被录取可能性的。后来，我幸好考入了山西大学，然而，天降不幸，“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革文化命。我在大学五年的生涯中，竟有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此时的我像一片飘零的树叶落到了太原市北郊区，能到通讯组“帮忙”，挣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已属幸甚，绝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当时的通讯组只有两个人，一次领导派我到小井峪公社下乡，听说

总序

这里有位插队的中学语文教师叫张厚余，是北大毕业，便萌生了相识的念头，虽说是想为领导物色个称职的通讯组干事，更多的，还是对北大毕业生的仰慕。亲历了“文革”的我，在思想深处，已经有了与官方宣传相反的认识，如山大中文系的教授马作揖先生、高捷先生、魏丕一先生等，他们当时或是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专政，或是正接受批判的对象，然而，在我与他们的私下交往中，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却都是忠厚长者和博学贤者。作为教师被下放到小井峪公社的这位北大生，肯定也是属于“牛鬼蛇神”或受批判对象一类，但是，我却认定：这些人中，不乏真才实学之士，能认识他，能让他也去通讯组“帮忙”，今后遇到学问上的事，不是就有了可求教之人吗？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与张厚余认识了，他那梳得整齐的背头，满面的笑容和谦和的神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区上后，在向政工组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我着意提到了张厚余，并且，怯怯地建议：是否可以让张厚余也来通讯组“帮忙”？闻听此言，那位领导猛然瞪起“山羊眼”，将一句冷冰冰的话甩给我：“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右派？”我不敢再说什么，当时，那首风靡全国的歌《社会主义好》，我在大众必唱的场所也跟着唱过，右派是什么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党和人民的敌人呀！

后来，我还多次去过小井峪公社，可是，再也没有见到张厚余。听说，市里和区上整顿下放干部，张厚余又被发送到离省城更偏远、更艰苦的娄烦县插队去了。

与张厚余再度相见，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其时，我被卷入北郊区清查扩大化中的一场大冤案，平反后，执意离开那片土地，调入了太原市文化局《并州文化》编辑部。当我着手创作一部以傅山先生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朱衣道人》时，张厚余与侯文正两人业已编撰完稿的《傅山年谱》，就成了我案头的必读之物。也正是这位在新时期获得平反昭雪的北大才子，在我的《朱衣道人》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出于对傅

山先生的共同敬仰，当即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为我这部作品做了评点。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交往多了，我也就由衷地称其为厚余兄了。

厚余兄出生于山西省寿阳县上曲村一个有着文化传承的普通农家，父亲是县城中学的一名教员，这让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自幼喜欢文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优异成绩，一举登科，考入北大。那时，他的面前仿佛阳光扑面，鲜花铺路，满腹诗情，喷涌而发，但谁又能想到，“伟大领袖”的一场“阳谋”，在全国知识界，一下子就网罗了五十多万右派。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补课中，一心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张厚余，也因一首阶梯诗中有几句批判现实的句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北京大学党委顺利地完成了补抓右派的指标，然而，一名对党忠诚、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却成了中国右派大军中的一名小兄弟。此后二十年，张厚余当右派的痛苦自不必说，即便摘了右派帽子的他也受尽了人间苦难，但是，作为教师的张厚余，在他的学生们的印象中，却始终是一位敏而好学、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然而，那时的厚余兄并没有什么文章能够发表，其中的原因我深有体会。1978年，我投给《人民文学》的一篇以反思“文革”为内容的短篇小说被编辑部选中，杂志社给太原北郊区委政工组来函，提出对作者进行政审。政工组回复：“此人受审查尚未解脱，不同意发表。”这篇小说便只能被编辑部割爱了。在那个报刊发表作品前，编辑部必须向作者单位发函政审的年代，厚余兄岂能提笔为文？他是在忍着心底剧烈的屈辱和悲痛，无奈地将一支生花妙笔束之高阁了啊。

“文革”结束后，厚余兄的笔下终于喷发了，这是压抑既久、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后的一种喷发，也是他多年坚持不懈的学识积累在中国进入新时期后，一种不发而不足为快的喷发。1981年，他调入了太原日报社，在《太原日报》副刊部任职。在我主持太原市作家协会工作时，他又被选为

太原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依旧是梳得整齐的背头,依旧是满面的笑容和谦和的神态,但是,我能看得出来——更多的是从他的创作和言谈中能感觉出来,他比以前年轻了许多,这是一种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后心态的年轻和灵魂的再生。许多年来,他以记者的身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和郊区的山川小路奔波,采访毕,便赶回家,在灯下连夜写作,记录下时代的脚步,书写出各类人物贴近时代和底层生活的原生态气息;他以学者的治学精神,每逢节假日,总是山西省图书馆或太原市图书馆的常客,翻阅史料,查检典籍,或埋头记录,或凝眉沉思,于是,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和名作赏析,在浸透着心血的写作中成文了;他以文学评论家的姿态,活跃在省城和全国的文坛上,赞美好的作品时,不乏精辟的分析,而批评作家的作品时,那怕是著名的、与他本是朋友的作家的作品,也直面坦言,显露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不随俗、不媚世的风骨,且不说当年他对外省作家叶蔚林作品的批评轰动全国文坛,就是对诸如韩石山、董耀章等省城作家诗人的批评,也让文坛同仁不得不敬其文笔的直率和尖锐,以我为例,既得益于其著文为我的作品叫好,也受益于其在有我在场的会上,对我的作品的批评。对厚余兄文学批评的评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当事者对其反批评,也是正常现象,可叹的是,当年厚余兄的这种批评精神,在今天的文坛更显的难能可贵了。

正是记者、学者、文学评论家的三重身份,或者说是集三重身份为一身的北大才子张厚余,终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属于他的春天。晚吗?是晚了一些,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春天是来的晚了,可是,比漫长的冰天雪地继续封杀春天,总要好了许多。更尊敬的,是厚余兄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退休生涯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他不仅继续笔耕,同时,整理出既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的曾经发表的文字,命名为《独自文存》筹划出版,这些文字,是一份北大学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此存照,也是厚余兄奉献给社会和他的后人

们的一份丰盛礼物。正如傅山先生所言：“所留在天地间，可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

自古所谓序者，大多是评介书中内容的文章，但《独自文存》的每一集中，已有厚余的朋友们各自为序，我岂敢在总序中，再对其文章随意指点？忆些旧事，谈点感想，遂成此文，如蒙厚余兄不弃，放在《独自文存》开头献丑，作为对读者了解厚余先生的一种导语，则我之幸也。

2013年3月30日

作者孙涛为太原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嘉奖的太原市优秀专家。曾被市文联授为太原市杰出贡献艺术家称号，被中共太原市委授为太原市文化领军人物、优秀作家称号。有二十余部专著出版。

读 张 厚 余

孙绍振

厚余与我大学同窗五年,留下的印象是名如其人,忠厚有余。最为鲜明的记忆有两个。第一,为人善良得有点天真,很容易被感动。大学一年级冬天,我们几个人,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在王府井北边)看夜场《雷雨》,明知晚上九点多结束,公共汽车只开到西直门,要步行到北大还有十几公里,我们仍旧奋然步行,寒风刺骨,不在话下。张毓茂嫌棉袍碍事,把前摆拉起来,覆盖在胸前。一个个脚下生风,只有张厚余赶不上,老是拉后,只好不时停下来等待。他气喘吁吁,鼻子里冒着白气,用那山西口音反复说:“哎啊,对不起你们啦。让你们久等了。”他那傻乎乎的神态逗得我们都笑了。以后模仿山西口音的“对不起你们啦”几乎成了他的外号。

第二个记忆,是他喜欢鲁迅。直至现在,我还是觉得,以气质而论,他应该喜欢王维、李清照、契诃夫、乔治·桑、屠格涅夫才是,鲁迅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冷峻、严酷,那么多的绝望,和他的忠厚应该是格格不入的。那时喜欢鲁迅的同学很多,他也许不是太突出的一个。我也有点喜欢,但是,觉得既然这么多人喜欢,也就不少我一个。再加上密友张毓茂,私下里对我说,不要看到处都有的书,要看就看离开北大就看不到的书。在他影响下,我就更把鲁迅暂且放在一边。大学五年,只读了《呐喊》《彷徨》中最有名的几篇,《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只是草草翻翻。倒是鲁迅的译文,如关于苏俄文艺论战,托洛斯基的文章,看了不少,读的最认真的是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那时课堂上的文艺理论太枯燥了。以苏联一个不知几流的文艺理

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图腾。传到中国来的,又是他的一个末流弟子毕达可夫。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可能是中国语言文学界权威教授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似乎没有信心,就请来了这位“苏联专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位讲师。但是苏联专家的薪资高的惊人,我们的讲师大约才九十多、一百多元,苏联专家一般是一两千。这位讲师,在卫国战争中断了一只胳膊。派他来到中国,可能就是给他失去的胳膊的补偿。可当局对苏联讲师却视若神明,把全国高校的文艺理论骨干教师都调来听课。苏联式文艺理论的机械唯物论和狭隘功利论,经过叶以群的著作进一步普及,直至文革以后,甚至今日流毒全国。所幸,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这位讲师已黄鹤杳然了。但是,他留下的教授套路并未消除,就是课堂上几乎全是语录,马恩列斯毛以外,就是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高尔基,有时加上一点鲁迅。和课堂上的教条相比,《苦闷的象征》中那种弗洛伊德式的文艺理论,完全是崭新的思想空间。鲁迅的译文很难读,但我却读得很细,还做了整整一本笔记。厚余亦未受苏式文艺理论的影响,仍坚持其与生俱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我更潜心于鲁迅。直至张厚余打成右派,我才知道他对鲁迅着迷。好像是他的日记,或者是文章,被拿出来批判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文章(或者日记)用的是鲁迅的笔法,有些句法,学的还真有点像。我有些唯美主义倾向,并没有意识到正是某种鲁迅式的洞察使他看到了我所没有关注的黑暗。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我一直以为,鲁迅那种尖锐,那种刻薄,或者用王晓明的话说,那种“毒”,他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像的。他是太善良了,太容易被感动了,他的气质和鲁迅应该是格格不入的。他很少意气用事,似乎从来没有和同学吵过架,红过脸。讨论问题时,时时显出可爱的呆气。

二十多年后,他平反了。我们相见数度,除了老了些,好像没有多大变化,山西式的普通话如故,容易被感动如故。二十年苦难日程,并没有使他变得老成持重,或者心理阴暗,书生本色不改,说起当年遭遇并没有多少怨

言,没有一点锋芒。他长期在太原日报副刊主事,从事文学文化批评多年。总觉得他的气质,和从事理论批评并不一定相合。我坚信钱钟书先生的话,说话尖刻的人,比较适合作批评。像他这样的个性,写散文也许会更轻松。这个想法,藏在我心头可能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回读他的文学评论集却动摇了我的观念。

在他的评论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张厚余。面对文风江河日下,文德败坏,他表现出少有的尖锐和勇敢,其用笔之锋利,其用语之尖锐,其情绪之激烈,实在令我惊讶。士别多年,当刮双目一看再看。在这样的文章中,他的风格再不是我的印象中的忠厚有余,而是义正词严,横眉冷对。这种文风,以批评我的朋友韩石山为代表。韩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鲁迅在1927年以后,“已经落伍了”,已经不是作家了。“最后十年听命于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鲁迅合作的搞起来的”。韩先生无疑是有学问的,他的学术著作可为证明,但是,韩先生的文风往往带点文人气,好为翻案文章,好唱反调。不免有时也说话走火。这在当今的文坛,已经是司空见惯。我有时还想,中国这么大个文坛,过去,官方控制太严,造成胡风所说的“舆论一律”。改革开放了,有些怪人、怪事、怪论,舆论不一律,才热闹,才活跃。即使对于非常离谱的言论,也该以上帝或佛祖的眼光视芸芸众生然,见怪不怪,一笑置之。但是,厚余却不然,这在他看来,不啻是一种亵渎。引起了他的义愤。这种义愤,对我说来,应该是一种警策。

当然,如果厚余仅仅是义愤,就不是厚余了,他的义愤和他的学养,可谓相得益彰。如驳韩先生之论,虽为报刊评论,旁征博引之广,却有一点学院味。引了鲁迅的文章,引用了韩先生并不一定赞成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引用韩先生所敬重的李欧梵先生的论断:“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一位作家”,其作品最具普遍意义的是“肯定自我”,其核心意象是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这还不算,还引用了鲁迅致许广平的信,说自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起伏,故忽而爱人,忽